

教育部通識教育
譯著系列叢書

大學的功用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Clark Kerr

本書是由美國加州柏克萊總校榮譽校長柯爾 (Clark Kerr) 於哈佛大學所發表的一系列演講編撰而成，是當前談論現代大學教育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柯爾為現代的巨型大學是否能夠身兼「刺蝟」（指專心致志於專門的研究領域）和「狐狸」（指博於五花八門的學科）的角色，大體上提出五點學校在態度上可以修正的忠告，並對於「狐狸型」大學的行動給予參考的藍圖，也建議「刺蝟型」大學需要維護大學自治及公共福祉。作者對當今大學現況有針砭入理的批判，並提出最有洞察力的建言。除此之外，柯爾對於「大學」或是「巨型大學」的理念應該是甚麼？更有著以古為鑑、採納各家思想的學者涵養。

本書首版在一九六三年問市，即廣受歡迎，不斷修正改版，迄今已進入第五版了。此書有當時柯爾對教育現象的預言，與後來實際狀況相互對照，有不少得到驗證。柯爾著述之用心，考察之嚴謹，曾獲得亞馬遜網站 (<http://www.amazon.com>) 讀者五顆星的評價，並可以看出他對當前美國教育問題之憂慮。在台灣當今人人上大學，錄取率接近百分之百的時刻，柯爾的觀察和論點更值得我輩深思。



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台北縣234永和市永和路二段285號6樓 | TEL 02 2232 4332 | FAX 02 2924 2812

<http://www.weber.com.tw/>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教育部通識教育譯著系列叢書

大學的功用

Clark Kerr

主譯 | 國立編譯館
譯者 | 楊雅婷

國立編譯館與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合作翻譯發行

2009 / 07

教育部通識教育譯著系列叢書

大學的功用 GE01-001

版權聲明

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5th edition by Clark Kerr
©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Weber Publication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指導單位：教育部

指導小組：方萬全、陳東升、黃寬重

策劃：教育部顧問室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

總計畫主持人：林從一

計畫成員：林思伶、吳美娟、柯華葳、苑舉正、陳歷歷、樂麗琪、羅竹芳

諮詢委員：林正弘、林思伶、吳嘉麗、黃 薈、賀陳弘、萬其超、鍾蔚文

原著：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

作者：Clark Kerr

主譯：國立編譯館 譯者：楊雅婷

出版者：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人：陳坤森

責任編輯：賴瑞萍、王姿婷、曹臻

住址：台北縣永和市永和路二段285號6樓

電話：(02)2232-4332 傳真：(02)29242812

網址：<http://www.weber.com.tw>

Email：weber98@ms45.hinet.net

營業事業登記證字號：13118544

初版一刷：2009年7月

定價：300元

展售處：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地址：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電話：(02)2518-0207 (代表號)

台中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台中市市區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傳真：(04)2225-8234

GPN：1009801499 ISBN：978-986-6816-87-1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

網址：<http://www.nict.gov.tw>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電話：02-3322-5558)

部長序

現代公民身處二十一世紀，世界流變環伺，培養學生具備知識創新、跨領域統整、問題解決與行動抉擇等能力及核心價值，是教育的使命與重任。近十餘年來，高等教育發展已由菁英政策走向普及教育，無論是結構性的蛻變，乃至制度性的改革，均面臨新時代嚴峻的挑戰與社會高度的期許。通識教育為全校性、跨學門的大學基礎教育，在重建精神價值、傳承人類文化、形塑品德情操，應發揮關鍵性的功能，成為現代優質公民養成的核心機制之一。

教育部自民國九十六年推動通識教育中程綱要計畫以來，努力建構以能力導向為基礎的教學，實踐以問題解決導向為基礎的學習，為使通識教育實施獲得更多理論上的支持及實踐上的引導，特別規劃「教育部通識教育譯著系列叢書」，藉由譯注引介國外根基厚實且影響深遠的通識教育理論，以及對通識教育的推展情形進行深切反思的論述。本項叢書計畫由各方學者推薦著作，包含介紹大學的理念、當代美國大學通識教育的發展歷史與革新的趨勢、通識課程的設計及教學方法，並遴聘專家審查譯稿，民國九十八年完成後陸續出版，民國九十九年全系列將譯竣發行並全面推廣。

通識教育的推動必須對通識教育理念有所體認，同時透過課程規劃與實施，搭配環境的陶冶與人文藝術活動的舉辦，豐富通識教育的內涵，共同激發師生對通識教育乃至於大學教育的省思，以逐步提升通識教育的品質，改善高等教育的環境。本系列叢書正是教育部近年來關懷各校通識教育發展的體現，計畫工作委由國立編譯館執行，渥蒙顧問室顧問及諮詢小組委員指導，結合譯文者、審稿

專家、導讀撰寫者、出版社等群策群力，始有今日成書之時，特撰序文，謹致謝忱，並期望套書的出版能為各大專校院推動通識教育燃起亮光、開啟新的思維，提升各專業領域教師對通識教育的認識，及提供通識教育教學研究人員更有價值的參考。

教育部部長

鄭瑞城

《大學的功用》導讀

楊思偉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大學的功用》(*The Uses of the University*)第五版於二〇〇一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可說是探討現代研究型大學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本書的最初原稿是作者克拉克·柯爾(Clark Kerr)於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哈佛大學戈德金講座(Godkin Lectures)上的著名演說內容，並以其內容為基礎修改而成。由於柯爾本人對於高教問題持之以恆的深度關注，其後每隔十年都有相關重要文獻納入本書，進行增刪後修訂再出版，此次為第五版。本書經由回顧西方大學的歷程，特別是美國大學在二十世紀的發展及轉變，論述了研究型大學的理念與困境、高等教育機構的領導人如何保護大學的自主性和公眾福利、如何發展成巨型大學等重大問題，因此任何人如果了解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美國研究型大學，就必須從仔細閱讀本書開始。本書可說論述深入淺出，批判鏗鏘有聲，出版以來影響高等教育發展甚大。

本書作者克拉克·柯爾，是前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之校長，卸任後曾任美國卡內基高等教育審議會理事長等重要職位，是世界著名之高等教育學者及實踐者，著作豐富。僅就這本著作而言，第一版在美國高等教育最蓬勃發展之一九六三年出版，其後分別於一九七二年、一九八二年、一九九五年、二〇〇〇年共五次修訂出版，幾乎每隔十年就針對當時大學環境作一檢視與預

測，提出許多鞭辟入裏之觀點，本書特別是對美國研究型大學有非常深入之探討，因此成為高等教育領域最長久之暢銷書籍，並翻譯成各國語言出版，對美國及世界高等教育之發展產生重大之導引作用，很值得一讀，以下分三項介紹本書之內容。

一、巨型大學之意義與特殊性

本書內容之主要用語是「multiversity」這個詞，中文應如何翻譯，可能見仁見智，而本書翻為「巨型大學」，與大陸翻譯一樣，也許某種程度可以表達現代美國研究型大學之特色與問題。當一九六三年柯爾提出這個詞語時，「巨型大學」(multiversity)的概念在當時成為「克拉克柯爾的怪論」(Clark Kerr's monstrosity)。甚至還有人含沙射影地說他是具有「原生法西斯主義」(protofascist)的意識型態。可是他仍然堅持自己之看法，所以他在第五版序言中說：

我在一九六三年於哈佛大學的「戈德金講座」中曾經談到：「美國的大學正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在與過去連接的同時，大學也正擺盪地朝向另一個方向」。我認為我瞭解當時大學擺盪前進的那個方向，而歷史也證明了我的觀點普遍來說是正確的。在當時，我已經遠遠地前瞻觀望到了二十世紀的盡頭。

柯爾的主要觀點，認為現代大學之理念已經從紐曼(Cardinal Newman)的英國模式，經過佛雷斯納(Flexner)的德國模式，再走入現代之美國模式。樞機主教紐曼在一世紀以前的《大學的理念》(1852)，他當時主張「博雅知識」(liberal knowledge)的普遍形及重要性，並認為「實用知識」其實是「一堆垃圾」，所以他的大學

理想典範是英國的牛津大學。而佛雷斯納的《現代大學的理念》(1930)，以柏林大學為典範，他認為大學不應該置身社會之外，而是必須處於大眾社會組織之下，必須關注整個社會之需求，所以不是培養「通才者」，而是「專才者」。可是正如柯爾所敘述的，當紐曼提出培育通才之觀點時，柏林大學式的轉變已在演變中；而當佛雷斯納提出那種論述時，當時美國之大學發展離那種大學已經越來越遠了。美國的「巨型大學」，以哈佛大學等為代表的大學模式，它的實踐者主要是管理人員，以及大部分的社會領導階層，它們「無意義地自貶身價，使自身變得通俗而呆版」，更糟的是它們「變成普羅大眾之『服務站』」。今日美國大學變得巨大無比，服務項目也包羅萬象，大學規模已經從柯爾所說的由英國模式的「鄉村」，至德國模式的「鄉鎮」，再至目前美國模式之「城市」。在這種模式下之運作、成員組織、治理體制、經費等當然產生很大之改變；學校教授關心的不是教育或教學，而是如何拿到更多之研究經費，以顯現出其重大之影響力，也許現代之研究型大學也有其無奈與不得已，但這些趨勢與現況，到底是優點或是缺點，是誰在主宰著？仍有許多可以討論之空間。

二、高等教育變遷與挑戰之不確定性

本書分成九章，其章節如下：第一章巨型大學的理念，探討巨型大學之意涵，及其歷史發展之經過；第二章聯邦撥款大學的現況，則分析聯邦政府經費之挹注，已經產生重大影響力量之情況；第三章知識之城的未來，探討研究型大學未來將走的道路；第四章一九六〇年代動亂之後的反思，重新檢視巨型大學之型態，及幾項重要之議題；第五章嘗試改革的失敗，提出幾個大學試圖改革之經驗與結果；第六章研究型大學黃金時期的評論，針對幾項關鍵議題提出檢討；第七章新的時代？漸富的聯邦政府到

漸貧的州政府，敘述美國研究型大學已經走入緊縮資源的第四個時期，未來將面臨更多的挑戰；第八章困難的抉擇，敘述美國大學面臨之困難；第九章知識之城如何在「狐狸世紀」生存？論述如何以狐狸之心態處理未來之挑戰。本書反覆陳述有關研究型大學之關鍵議題包括「大學理念」、「大學教育本質」、「通識教育」、「大學治理」、「教授文化」、「校長角色」、「研究型大學圖像」等，從歷史去追溯，並反覆論證相關觀點，相信對關心高等教育之各界人士有很大之啟示。

正如同在序言中所交待說明的，在不同時期出版之版本，各章節其實都做過修訂，而本書是在二〇〇〇年時由作者重新整理調整重要之部份彙整而成，因此其可讀性非常高，具有時代之意義。另外，在一些觀點方面，作者會反覆論述，舉例而言，在第一章提到有關大學校長角色問題時，他說「以美國的情況來說，美國的大學校長，被外界期待作為學生的朋友、教職員的同僚、與校友交好的伙伴、可靠的董事會管理者、善於對群眾演說的講演者、能夠與基金會和聯邦機關周旋的精明談判者、可以和立法機關協調的政客、相關工業、勞動與農業等產業的朋友、具有說服力能與捐助者溝通的外交官、通識教育的提倡者、專業學門的支持者(特別是法律與醫學這兩個領域)、面對媒體的發言人、獨立自主的學者、州與全國層級的公僕、平等擁護歌劇和足球的熱心人士、擁有道德合宜的人格、一個好的丈夫與父親，以及教會中的活躍成員。最重要的是，他必須能夠享受搭乘飛機到處旅行這樣的安排，必須能夠在公開場合中吃飯，以及參加公開典禮。」然而，他也說「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兼顧所有這些角色。有些人甚至連一個角色都無法成功地扮演。」當然，不同時代對於大學校長有不同之期待，而且能力愈多愈佳，只可惜通常是容易同時兼具的。然後在第四章，他也綜合論證大學校長應是「仲裁者」、「進步之引發者」、「論爭的鬥士」及「形象之製造者」，前

後呼應論述，讓讀者更易理解其觀點，讀來令人印象深刻。

另外，對於美國研究型大學之發展趨勢，作者採取「從審慎的樂觀主義到審慎的悲觀主義又回到審慎的樂觀主義」，分析未來美國研究型大學之特徵，作者認為將有1.更多的私有化；2.更多的聯邦化；3.更多來自一般公共支援的培植；4.對資源有效運用的更多關注；5.更多元化的領導權；6.對長期的運動方向更加關注；7.對「非市場」功能的保護考量。同時，作者預估三十年後，可能有以下之問題：1.國家生產力將發生何事？2.美國社會將對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給予哪種優先排列選項，針對研究型大學較為具體，在可得資源方面的分配會如何？3.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包括研究型大學，是否會藉由具有進取性與明智的回應方式，來掌控自身未來？這些不確定之因素都可能影響未來之發展，證諸最近由美國次級房貸所引發之金融海嘯，導致美國研究型大學經費大幅縮水，其引發之效應一切都仍在發展中，也許已經改變作者當時預測本書之時空背景，因此其未來命運仍在變動之數。

三、我國高教發展之思考與借鑑

國內高等教育經歷一九九〇年代「廣設高中大學」政策之影響，目前面臨重大之挑戰期，其挑戰包括大專校院過多及未來少子化之威脅、公部門教育經費編列減少之趨勢、研究型大學成為百大之目標、一般大學提升教學品質之社會壓力、大學培育人才與產業需求之結合、如何提升科技研發、大學生就業等。這些重大問題，是在一九九四年民間建議廣設高中大學，並透過政策遊說壓力後造成的。當時仍是台灣經濟處於較佳情況之際，也是高等教育入學率已經進入普及階段之過程中，所以高教入學率逐年增加，加上鼓勵私人興學，技專校院升格為學院和大學，部分政

策性設立了公立大學，所以高等教育呈現一片榮景，大學校數也達到一百六十餘所，促成高等教育進入馬丁·特羅(M. Trow)的後普及化之「普及管道」(universal access)階段。不過這種榮景只維持不久，立即出現大學生素質下降、十八分或七分就可進入大學、部分私立技專校院逐漸招生不足、專科紛紛停招改設學院、教學品質受到質疑等，受到社會各界之矚目與批判。

現今政府在高教政策方面，組織了高等教育永續發展委員會，定期檢討高教政策，雖然暫時沒有具體之結論，卻也表示教育部及執政黨對高等教育角色、功能與發展之重視。

政府現階段對「研究型大學」，提出「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之計畫，以五年五百億經費預算，希望在十年內發展出至少一所世界百大之大學及若干頂尖研究中心，其基本政策動機及目標可以理解，但對執行之策略卻也被社會大眾多所質疑。到底為何台灣至目前為止沒有建構產生一所世界百名內之大學，的確有許多值得探討之處。閱讀本書了解美國研究型大學之所以能夠不斷改革與提升，除了傳統上美國創造了新式的美國式競爭方式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其中無論是大學理念、組織結構、運作方式、校長角色、經費挹注，招生方式，國家與大學之關係、大學治理等都有其特殊之處，而國內相對的並沒有較深入探討相關議題之內涵，常常在一知半解情況下就引入相關制度，因此導致事倍功半的結果，也無法達成原定之目標。這些年來，教育部在高教政策之建構與政策執行，的確已經獲致相當成果，而高教行政之官僚體系也有相當之專業性，令人欽佩。不過，決策機制中參與人員之適切性、決策過程之合理性與穩定性、執行時之管控機制等，也許仍有可以討論之空間。如果以本書作者之觀點，則在國內「研究型大學」方面，包括是否成為巨型大學之問題、大學之辦學理念宜加以釐清之問題、大學內部教授與行政之關係、大學與國家之關係、大學內部行政問題、校長遴選與角色功

能關係、政府經費挹注、大學如何向社會爭取經費問題、大學之績效責任等，都是亟待進一步討論與解決之議題。

柯爾在本書中，同時不斷在提醒一些重要之高教理念爭論點，即對於大學之理念到底何在之問題，其理念鐘擺之兩端不外乎以下幾項：

- 辦學應重視人文與歷史——還是重視科技發明
- 理念應該儘量超脫——還是重視功利與實用
- 辦學效能應以教學為重——或重視研究成果
- 學生應被教導成完人——或培養成技術性專才
- 學習應重視博雅教育——或是某種學科專業之發展
- 大學規模應該有所控制——或是愈大規模愈好
- 校長應做學術人格之楷模——或是掌管知識之經營者

大學應基於理念因應外部之變遷——或根據外部變化而調整理念呢？而研究型大學之走向如何，也仍會在上述理念鐘擺間擺盪。探討這些問題之關鍵，似乎仍在於大學是否分類，其功能角色是否有所區隔之問題。大學類型應該多元化，以回應不同資質學生之學習需求；重視單科大學存在之重要性，例如師範教育大學、體育大學、藝術大學等，其必要性已經不言可喻，這就像政府特意發展研究型大學一樣，希望提升其研究與教學成效、擴增大學部學生比重、強化產學研發等。對於特殊類型學校也應編列特殊扶持補助辦法，因為畢竟大多數之國民是就讀在這些大學的。

不過，我想任何國家之高等教育，其內外部之環境與背景絕對不會一樣，所以雖然我國高教之發展策略，仍以美國模式為主，以發展大眾化之高教模式為主，而且許多典章制度也以美國馬首是瞻，有意無意間都在學習美國，這是台灣教育發展中一向

較難克服之宿命。然而其實以台灣經濟與政治之發展階段，我們應該早可脫離教育邊陲之地位，可以本土實證之教育研究成果發展自己之高教模式，如大家不斷在探討之大學過多，鼓勵整合之問題；教育大學是否需要消失之問題，如何確立師資培育之特殊性；以及大學評鑑之更精緻化，國立大學法人化之問題等都應都做政策之論辯，都不一定要引用別國經驗，而可以發展我國自己獨特之高教模式，這是應該期待並加以努力的。因此就本書之翻譯出版，是國內推介美國高等教育發展書籍中較少之出版物，相信對國內高等教育發展會有更多引發思考與論證之空間。

二〇〇一年版序言

高等教育的新紀元

我在一九六三年於哈佛大學的「戈德金講座」(Godkin Lectures)中曾經談到：「美國的大學正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與過去連接的同時，大學也正擺盪向另一個方向」。我認為我瞭解當時大學擺盪前進的方向，而歷史也證明了我的觀點普遍來說是正確的。當時，我已經遠遠地前瞻觀望到了二十世紀的盡頭。

現在我們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我再次看到美國的大學正處於歷史的樞紐中。然而，這一次，就我的觀察而言，我發現這個關鍵的交接點正如乘風拍動一般，被吹向許多不同的方向；而令人嘆息的是，這股並不是和緩的微風。因此，我在二〇〇一年的新版本中，新增了一個章節，檢視、回顧一九六三年當時大學運作的情況，並且概括某些為了未來所提出的可能性，當這些可能性在二〇〇〇年出現時，能夠有一些因應之道。當然，我也明白現在的我已不再像一九六三年的我一樣，擁有「正常視力」，能夠清晰地看清所有的事情，但觀看接下來在這條大學運作之路上會發生些什麼，對我來說仍具有相當的吸引力；這條路，依我之見，充斥著不平的坑洞，被強盜土匪環繞，並朝向不清楚的終極目標。

因此，《大學的功用》這本書的第五版，以一個新的章節作為此書的結束，這個章節比較了一九六三年與二〇〇〇年的情

況。在這個部分之前，第一章、第二章與第三章是我在「戈德金講座」的演講原文。之後附加了一些論文，我在這些論文中談到的，包含了二十世紀最後十年間的相關發展，這個部分已收錄於接續的版本中。

本書第四章，寫於一九七二年，這個部分的內容包括了某些我在一九六〇年代學生暴動之後的反應。我在一九六三年的演講成為當時學生運動的標靶。這些抗爭的學生所忽略的事實是，我同樣不喜歡新世界所充斥的病狀，我也是這些病兆最初且重要的批判者。「巨型大學」(multiversity)這樣的概念在當時遂成為了「克拉克柯爾的怪論」(Clark Kerr's monstrosity)。甚至還有人含沙射影，說我具有「原生法西斯主義」(protofascist)的意識型態^①。當時在柏克萊校園的史鮑爾廣場(Sproul Plaza)中，將對我的稱號簡稱為「法西斯主義者」(fascist)。也許，有人會認為，對於一位大學校長來說，不發表任何看法是比較明智的，如果要發表看法的話，只要表明一些陳腔濫調就好了。為了成為一個誠實且實際的評論者，我付出了相當重大的代價。

本書第五章完成於一九八二年，此章內容回顧伴隨學生抗爭運動落幕後，十年間所企圖完成的學術改革；這段期間內，產生許多宣言，但僅有少數持久性結果。其中較特別的是，「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作為激進教職人員與學生對於大學治理所採取的方法，只是曇花一現。於此期間重要且持續的改革，是建立了頌揚民族、種族與性別多樣性的課程，其影響大型大學的課程設定，大約在等於或小於一個百分點左右。這種伴隨學術改革的經驗，說明了某些教授，當他們看向外部世界時，能

① 「簡而言之，卡爾的論述將成為原生法西斯主義意識型態的著作」(粗體原引文即如此強調)。Hal Draper, "The Mind of Clark Kerr" in Draper, *Berkeley: The New Student Revol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p. 212。

夠多麼激進，但當他們看向自己的內在時，卻又是多麼地保守，這是一種分裂的人格。

至於本書的第六章，是我在一九九五年版本中附加三段評論中的第一部份。回顧當時的思維，我現在能夠注意到他們普遍悲觀的論調：大學生「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終結，以及校園中因為研究領域、意識型態與性別和種族地位所造成的分裂。然而此時，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當時美國的大學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機構。美國大學已經取代了德國大學從十九世紀末到一次世界大戰時領導世界的地位。

一九六三年是一段令人興奮、充滿活力的時期；到了一九九四年，當我撰寫這篇論文時，卻充滿了失落、自我懷疑的氛圍。為何時代氛圍有如此重大的改變？因為經濟生產力的增長跌落到歷史低點，導致資源的流動減少。聯邦政府已經耗盡了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高等教育投注巨大資源之熱忱，因為其支持研究與發展以及伴隨而來的獎學金與學生貸款實在過於龐大。

雖然預期一九八〇年代會發生的「人口衰減」現象並未實現，但學生入學的激增現象確實已經趨緩。

而所謂的學術改革也虎頭蛇尾、草率收場。最後一項試圖恢復輿論對大學生及其博雅教育的注意力所進行的嘗試，於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推行，結果也遭致失敗，如同先前在芝加哥大學所進行的「赫欽思實驗」(Hutchins experiments)與在哈佛大學所進行的「紅皮書」(Red Book)改革一樣。大學社群分裂成許多引發爭議的部分。經濟衰退也縮減了國家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補助。一九六三年風行的「慈光引領」(Lead, kindly light)口號，到了一九九四年，已經變成「重重幽暗」(encircling gloom)。

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我都還未瞭解當時學術氛圍所經歷的轉變究竟有多大。這已經成為所有可能世界上最糟的一環。高等教育自一九八〇年代即進入衰退期，並持續到現在——學術界